

### 文匯 訪談

# 梁振英：

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世界各地的日常，包括香港原訂於下月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面對第三波嚴峻的疫情，社會不應冒險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。至於押後選舉衍生的一年「真空期」，梁振英指出，基本法並不容許立法會議員的任期由4年變5年，而解決問題的概念應是如何有一個臨時性的立法機關以行使其權利，令香港運作盡量正常化。他認為，早前報名參加立法會選舉並被取消資格者，已被裁定不能依法成為立法會議員，故無論「真空期」的議員問題如何解決，有關人等亦不應以任何方式擔任議員的工作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 
歐陽文倩、聶曉輝



■梁振英指出，應研究組成一個臨時立法機關，令香港運作盡量正常化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

# 被DQ者無資格當議員

## 基本法不許任期「4變5」 組「臨立會」解「真空期」

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，市民都認同宅家抗疫，減輕醫護負擔，偏偏攪炒派就稱押後選舉是「政治打壓」，要求如期選舉，以選舉和被選舉權蓋過廣大市民生命安危。梁振英直言，特區政府一有重大決定，從沒見過反對派不反對，「這是反對派的『市場定位』，大家要思考的是，在今日疫情形勢下，我們是否要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。」

### 疫情嚴峻不能冒險投票

早前疫情趨緩，社會一度以為見到曙光，梁振英坦言，第三波疫情對各行各業的打擊相當大，倘疫情持續，商戶放棄下去，就會有大批基層員工失業，「大家不要以為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很豐厚，『家有二萬，每日二錢，全無生計，用得幾年？』」到特區政府不能再派錢，香港完全無任何天然資源，作為高度開放經濟體但全球未能如常往來，「我們可以撐多久？」

攪炒派還指稱特區政府抗疫不力才導致選舉押後，梁振英認為應用數字說話：不論是對比人口較少的新加坡，或西方國家如英國、美國、西班牙

等，香港的確診、死亡的人數和比率都遠遠為低，「我們不應讓反對派無理打擊特區政府團隊的士氣，該批評的批評，該讚的就讚。」

他說，特區政府總的來說做得相當不錯，但香港確實出現連續12日每日過百宗確診個案，「我們不應冒這樣的風險，動員300多萬人出來投票。」

坊間對押後選舉一年的「真空期」，是否以現屆議員延任代替有不少討論。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指出，基本法清楚寫明立法會議員任期是4年，並不會因為疫情而自動變成5年，「人大常委會是否開會修改基本法，這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，但今天而言，任期就是4年，即是任期屆滿就會結束，沒有延期一說。」因此，他認為解決問題的概念，在於如何有一個臨時性的立法機關，以行使其權利，令香港運作盡量正常化。

至於早前報名參選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而被DQ的人，梁振英直言有關人等，包括4名現任立法會議員，「不應該在未來12個月的『真空期』裏，通過任何方式成為立法會議員。」

他解釋，有關人等被DQ，是因為他們不能依

法成為立法會議員，即他們違反了基本法、不擁護基本法，或是要求外國「制裁」香港，不效忠香港特區，「DQ他們其實與選舉無關，而是這些人乾脆就不應該成為立法會議員。……不論接下來一年的議員是用選舉產生，或非選舉辦法產生，無資格就是無資格。」

### 乞外國「制裁」違法不忠

被DQ的現任議員中，還包括一些人聲稱「相對溫和」的會計界議員梁繼昌。梁振英說，其「溫和」體現於他無衝擊議會，「但他在美國要求美國政府『制裁』香港這一點是絕不溫和的，他自己亦欲辯無辭。」

可以預見，攪炒派將繼續炒作有關議題。梁振英指出，香港過去長時間習非成是，縱容出一班這樣的人，但強調全世界任何社會，不論什麼政治制度，無一個社會會容許自己立法機關的成員去外國議會、向外國政府要求「制裁」自己政府，「只是DQ不讓他們選立法會，已是相當輕微的懲罰。在很多社會，這是刑事罪行，可以被告，可以坐監。」

# 反對派須忠誠 不能反對國家

過去兩三年，傳統反對派走向極端，變成攪炒派的一分子，並在法制檢驗下被排除於體系之外，甚至要負上刑責，政治前途暗淡。梁振英直言，反對派整個策略是錯誤的，低估了中央根據基本法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心。未來，反對派前途如何，視乎他們是否按基本法辦事，並強調反對派應該是「忠誠的反對派」，「包括忠誠於這個地方，不能要求外國政府制裁我們這個地方；忠誠於國家，不能反對我們的國家。這些『ABC』，反對派要從頭學起。」

「他們不能自我催眠。」梁振英形容，反對派每一次搞政治議題都「鍊爆」，每一次都因加得減，由2014年的違法「佔中」，到去年的修例風波，「他們每一次做到了什麼？得到了什麼？」

### 強加「公民提名」反拉倒普選

他以2014年反對派聲稱要「真普選」為例指出，根據基本法落實的普選才是「真普選」，惟反對派當年高舉所謂「公民提名 必不可少」，但基本法中已清楚講明，行政長官選舉是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。當時，反對派還發起「佔中」以「爭取」他們口中的「真普選」，「他們到了後期還在自我麻醉，覺得中央可能在最後一刻答應讓大家有『公民提名』。」

時任行政長官的梁振英坦言，當年的政改，明明可以讓大家得到普選，但反對派偏偏不要，「（反對派）現在後悔不後悔呢？心裏一定後悔，但嘴巴不肯說。」

梁振英重申，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比倫敦、紐約或東京市長為大，不是只有他們的市政、衛生、交通等地方政府一般權力，還有高度自治的權力，因為有別於外國市長單純由選舉產生，香港行政長官還有中央加持，通過實質性任命將額外權力授予行政長官，是兩種權力來源。因此，行政長官的產生不能將中央「擺在一邊」，不能否定中央權力。

去年修例風波爆發，又出現一句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」，梁振英批評反對派是在繼續荼毒年輕人、他們上街，誤導他們可透過暴動、燒、打、殺「爭取」，「我認為攪炒派，『勇武』也好，『和理非』也好，老謀深算，坐在家中度橋的大頭，或在街上跟着他們走的十多歲少年也好，都應該靜下來反省一下。他們整個策略是錯誤的，而且他對中央堅持根據基本法行事的判斷是錯誤的，他們低估了中央根據基本法解決香港問題的決心。下去他們的前途如何呢？必須按基本法辦事，包括普選的落實。」

### 應從頭學起做「忠誠反對派」

談到反對派應「何去何從」，他認為，反對派有反對派的模式，但反對派要是「忠誠的反對派」，就如英國的「Her Majesty's Loyal Opposition（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派）」，「忠誠包括什麼？包括忠誠於這個地方，不能要求外國政府制裁我們這個地方；忠誠於國家，不能反對我們的國家。這些『ABC』，反對派要從頭學起。」

■立法會選舉因應疫情嚴峻被迫押後，出現一年「真空期」。圖為一位立法會職員看守着議會大廳。  
資料圖片



■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。  
香港文匯報記者攝

# 抹黑國家助檢測 販賣恐慌嚇市民

香港第三波疫情已持續一段時間未能平息，國家隊馳援香港，助香港市民做大規模的檢測，切斷病毒傳播鏈，惟攪炒派又炒作陰謀論，稱「市民的DNA會被送到內地」、內地檢測「不達標」。梁振英表示，有擔心的人大可以不接受檢測，並指出這些陰謀論就如當日反對派阻撓高鐵西九站「一地兩檢」，都是在「販賣恐慌」，但事實證明並無他們說的問題，反而是運作良好。

梁振英指出，當日政府想在西九站做「一地兩檢」，有人就開始散播恐慌，說在西九高鐵站會被人拉到內地口岸區，然後會「被消失」，但現時看來，西九高鐵站運作得非常好，在疫情之前，乘搭的人越來越多，從來沒有出現反對派「販賣恐慌」時說的情況。

當時不少人對這些陰謀論感到無奈，認為如果這些人有擔心，大可以不乘搭高鐵、不去西九站、甚至不去內地。梁振英說：「今日內地幫香港做大型的檢測，一樣的道理，你驚，就不用。」他續說，不論是什麼擔心，市民大可以選擇花二三千元的在私家醫院排隊做檢測。

他直言，典型的反對派的「養分」就是靠市民對任何一件事的猜疑，但質疑攪炒派到底可以為市民檢疫提供什麼實質性幫助，「或者提出這些恐懼的攪炒派政黨，不如拿些錢出來在私家醫院門口派。」

## 妄稱打「國際戰線」 攪炒派自欺欺人

香港國安法實施下，攪炒派無從禍港，唯有高舉所謂「國際戰線」，並因應外國政府言論而聲稱「攪炒成功」，梁振英批評這些想法都是自欺欺人，因為從客觀上看，自從全國人大就香港國家安全問題作決定後，「外國政府無論如何叫囂，我們仍是朝着自己定下來的目標進發。我記得過渡期時，當年代表國家與英方談判的周南先生講過一句說話，『兩聲猿啼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』，這個也是今日的寫照。」

梁振英指出，1982年，即38年前的中國，很多攪炒派的頭面人物都未出生時，中國可以對着英國講「這個地方是我的，你不要恐嚇我們，不要和我講中國收回香港會有『災難性的影響』。這個地方是我們的，我們不收回，對不起歷史，對不起人民」，「今天的中國，在各方面的力量，包括國際層面的力量，大過當天的中國。我們國家下了大決心，不能讓外國在香港為所欲為。」

## 解社會深層矛盾 決策流程須變革

「我們用法律處理違法犯紀的人，但同時社會上很多深層次矛盾，我們需要變革。」梁振英認為，警方過去一年的執法行動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，雖然令市面平靜下來，但市民的一些不滿、社會的深層次矛盾，必須透過變革來解決，包括在土地供應方面改革流程，「讓土地供應快一點，因此多一點，因此樓價不用那麼貴，大家可以稍為住得好一點。」

梁振英說，樓價高企，有些人決定不買樓而租樓，但奈何租金也很貴，香港人居住的條件很差，部分基層市民迫住劏房的情況亦令人痛心。他指，香港樓價貴，不是因為土地少，而是建屋的土地少，「兩者之間的分別就是我們

要走程序，要去城規會、再去立法會，然後又兜兜轉轉，又要去區議會等等，很多時候又會遇上司法覆核。這些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東西，這個流程可否快一點、可否暢順一點，大家七嘴八舌之後，是否可以做一個統一的決定，使得土地供應快一點，因此多一點，因此樓價不用那麼貴，大家可以稍為住得好一點。」

除了住屋問題，梁振英認為經濟結構、收入分配、教育問題等都要處理好，這些都是接下來要做的工作，「香港相當長時間以來高度政治化的情況，是越來越惡劣的，我想應該到此為止了。」